



我所了解的蒋家王朝内幕丛书

蒋介石的 密友近臣

JIANGJIESHI DE MIYOU JINCHEN

文昊 / 编

一手
独家史料
亲历亲见
亲闻

打开中国第一家族的尘封秘史
透视民国高层关系的隐情秘事

解读一个短暂王朝的兴衰密码
剖析一代乱世枭雄的权谋秘术

中国文史出版社

我所了解的蒋家王朝内幕丛书

蒋介石的密友近臣

文 昊/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蒋介石的密友近臣 / 文昊主编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 1

(我所了解的蒋家王朝内幕丛书)

ISBN 7 - 5034 - 1438 - 3

I. 蒋… II. 文… III. 政治人物一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IV. K827 =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4577 号

《我所了解的蒋家王朝内幕丛书》

蒋介石的密友近臣

责任编辑：于保政 封面设计：孙少伟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址：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装：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邮编：102612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 × 1168 1/32

印张：14 字数：335 千字

印数：5001 ~ 7000

版次：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总定价：110.00 元(全五卷) (本册定价：22.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先亲后疏，患难之交张静江(1)

张静江和蒋介石相识很早，本是拜把子的盟兄弟，并在经济拮据时曾经共同在上海做投机生意。但在蒋介石发迹之后，二人的关系却出现裂痕，渐行渐远。个中缘由何在？除了“时位之移人也”的古训在起作用外，也与蒋、张二人的性格和为人处世习惯不同密切相关。

- 一、共谋财路，创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1)
- 二、蒋介石、张静江关系的演变(7)
- 三、张静江与蒋介石感情破裂的内情(25)
- 四、蒋介石、张静江等做交易所经纪的物证(28)

目

第二章 歪打正着，亦师亦友黄金荣(32)

蒋介石得以结识黄金荣，实属偶然，纯粹是因虞洽卿和黄金荣的算计之心使然。黄金荣万万没有想到，他不经意间给落魄中的蒋介石的那一次慷慨解囊，居然成为自己日后飞黄腾达的绝佳机缘。当然，蒋介石对他的特殊眷顾，除了这一份师徒情谊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 一、蒋介石与黄金荣的“师徒缘分”(32)

录

二、我所知道的黄金荣 (36)

第三章 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杜月笙 (63)

从投靠黄金荣到自立门户，杜月笙花的时间并不长，这主要得益于他那一套娴熟无比的混世手腕。作为上海滩大名鼎鼎的青帮头目，杜月笙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和建立国民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不仅靠反共造成了自己的特殊努力，而且因此深得蒋介石的信任，颇受国民党政权的关照。不过，临近日暮穷途之际，蒋介石还是默许蒋经国拿他的儿子杜维屏开刀，以维护蒋家的统治。对此，杜月笙敢怒不敢言，只能暗中做手脚。

- 一、后来居上的流氓大亨 (64)
- 二、靠反共造成的特殊势力 (78)
- 三、蒋介石给足了杜月笙面子 (89)
- 四、第一个大发国难财和接收财的人 (96)
- 五、蒋介石丢卒保车，杜月笙日薄西山 (105)

第四章 党国元老，密友忠臣吴忠信 (114)

吴忠信是国民党元老中的典型人物之一，是当时具有相当影响的政治要员。他之所以成为蒋介石的密友和忠臣，除了历史渊源深厚外，还与他有“政治头脑”有关。在蒋介石的眼中，吴忠信可冷可热、贵贱由人，而且不争宠、不恃宠，这或许正是他受宠的最主要原因。

- 一、吴忠信在孙中山时代的政治活动 (114)
- 二、缘何成为蒋介石的密友和忠臣 (116)
- 三、蒋介石三次下野的参与者 (119)

四、筹边政策及其在新疆的统治	(126)
五、与国民党派系人物间的联系与矛盾	(140)
六、吴忠信的“合肥”精神	(146)
七、吴忠信的政治班底	(148)
八、吴忠信的家庭经济生活	(151)

第五章 “反共先知”，竭力效命的张继 (154)

在蒋家王朝的上层人物中，张继是深得蒋介石信任的少数几个北方人中的一员。他之所以能够获此“殊荣”，并非缘于国民党元老这一特殊身份。一方面，他是顽固不化的反共分子，终其一生都坚持反共立场；另一方面，则为巩固蒋介石的统治而积极往来奔走。所以，蒋介石投桃报李，没有亏待他。

一、张继早期的政治生涯	(154)
二、坚决反共，为蒋介石效尽犬马之劳	(163)
三、张继点滴见闻	(169)
四、张继在清华大学骂人出丑记	(175)

第六章 栽培嫡系，蒋家天下陈家党 (181)

“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曾是某些国民党人自相标榜的一个口头禅。事实上，这完全是一句自欺欺人的鬼话。国民党不仅从建立之初就存在派系，而且数量众多，矛盾尖锐。蒋介石为了巩固其统治，不仅支持心腹之臣陈果夫、陈立夫建立和发展派系组织，而且自己也亲自出马，网罗亲信死党。

一、“二陈”与国民党 CC 派	(181)
二、CC 的扩张活动	(196)
三、中统巨恶徐恩曾	(209)

四、手握军政实权的谷正伦	(219)
五、我所了解的各正纲	(226)
六、复兴社的建立及其骨干	(241)
第七章 暗杀专家，第一号杀手戴笠	(258)
戴笠是军统特务的首脑，他阴险狡诈，变化多端，性情反复无常，令人难以捉摸。他是蒋介石佩在身边的一把犀利的匕首，也是最善于窥伺主子意图和博得蒋介石欢心的一条忠实凶狠的走狗。戴笠忠心耿耿地执行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在为蒋介石排除异己、巩固政权、保护人身安全等方面，可谓费尽心机，竭尽所能。因此，他生前能得到蒋介石的格外垂青，死后也令蒋介石伤心无比。蒋介石亲自一再为他挑选墓地，可见主仆关系之深确非一般可比。	
一、戴笠的出身及投蒋	(258)
二、戴笠是怎样起家的	(261)
三、我所了解的戴笠其人其事	(280)
四、抗战胜利后的活动及摔死真相	(356)
五、戴笠的两段“精彩”自白	(377)
第八章 五星上将，贴身近侍钱大钧	(380)

 钱大钧出身日本士官学校，资历较深，与蒋介石几乎旗鼓相当，但后来他却屈居侍从室主任之职。不过从表面看，蒋介石也没有亏待他，让他屡任要职，封为五星上将，声名显赫一时。钱大钧是蒋介石黄埔嫡系中最得力的干将之一，在西安事变中陪蒋中弹负伤。可是，当蒋介石听到这一消息

后，竟然只是轻轻地哼了一声，其他任何表示都没有，这使钱大钧实在感到太伤心。

- 一、我所知道的钱大钧 (380)
- 二、我的连襟钱大钧 (388)
- 三、痛定思痛，钱大钧谈西安事变 (393)

第九章 得宠失宠，起落浮沉难自料 (399)

蒋介石生性多疑，对下属猜忌颇多，而且反复无常，所以要想长期获得他的欢心是极其不易的。

所谓“伴君如伴虎”，稍一不慎就可能被他打入冷宫。与蒋介石有过交情或关系较为亲近的人中，尽管不乏游刃有余者，但同样也有很多人在走下坡路。我们在此撷取了正反两方面的几个典型人物，立此存照，以资参阅。

- 一、倍受蒋介石赏识的得力助手俞飞鹏 (399)
- 二、贺国光追随蒋介石的钻营术 (411)
- 三、宣铁吾同杜月笙上海斗法内情 (419)
- 四、平步青云却壮志难酬的吴国桢 (428)
- 五、邓文仪失宠于蒋介石之后 (439)

第一章 先亲后疏，患难之交张静江

张静江和蒋介石相识很早，本是拜把子的盟兄弟，并在经济拮据时曾经共同在上海做投机生意。但在蒋介石发迹之后，二人的关系却出现裂痕，渐行渐远。个中缘由何在？除了“时位之移人也”的古训在起作用外，也与蒋、张二人的性格和为人处世习惯不无密切关系。

一、共谋财路，创设上海 证券物品交易所

大概是在 1916 年，孙中山先生为了筹措革命经费，采纳了日本某政党的建议，具呈向北京农商部申请在上海区域内创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这个呈文是朱执信写的），经营证券、花纱、金银、杂粮、皮毛等五种，资金总额定为国币 500 万元。农商部当时只有“证券交易所法”可资依据，依照该法规定，证券和物品不能同时交易，因此对孙中山先生的呈文未予批准。这件案子也就搁置下来，孙中山先生也未再继续进行。

过了一年半载，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因为经济非常

拮据，共谋生财之道，乃利用前案，进一步与日本某政党所介绍的某企业代表协商关于开办交易所的具体办法以后，即着手进行。首先，他们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叫“协进社”的秘密社团谋划其事；其次是拉拢虞洽卿、赵家艺、盛丕华、洪承祁等为社员，以扩大力量；最后又由虞洽卿等再拉拢当时上海工商界中所谓知名人士如温宗尧、闻兰亭、李云书、张澹如、沈润挹、吴耀庭、顾文耀等共任发起人，具呈向农商部申请创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他们正在积极筹备之际，事为南通张謇所悉，通电反对。

张謇反对虞洽卿等创办交易所的原因，是由于他知道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易所均采一区一所制，政府若准许虞等创办在先，别人就不能在同一区域内再办；尤其是他在南通办盐垦多年，当时正种植棉花，而且大生纱厂也已开办起来，自己手中有花、有纱、有布，岂肯任人支配。他反对虞洽卿等创办交易所的理由有二：一是交易所既是一区一所，即不能多种经营，做了证券就不能再做物品，如单营物品，则做了棉花就不能再做纱布；二是交易所不能依靠外资作股本。在这样的情况下，虞洽卿虽有上海各业领袖和总商会的支持，但农商部也很难批准他的申请。实际上这是虞洽卿的多种经营与张謇的单种经营的争权夺利之争，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

日商于 1919 年在上海日领事馆注册，在上海租界三马路开办了“取引所”（即交易所）。虞洽卿便以抵制取引所为借口，电请农商部迅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案予以批准。同时，沪海道尹某也打了一个密电给北京说，关于虞洽卿申请创办交易所一案如再不批准，他们将在租界内先行交易，如地方官厅予以封闭，反使日商取得专利云云。事实上，虞洽卿也把交易所“先行交易”起来了。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长为虞洽卿，常务理事为郭外

峰、闻兰亭、赵林士、盛丕华、沈润挹、周佩箴等六人。理事 17 人，我是其中之一。监察人是周骏彦等。陈果夫当时是第 54 号经纪人，他的老板就是蒋介石。经纪人头上戴白布帽子，帽上各编有号码，以资识别。经纪人卖出买进不拘若干次，成交须经拍板员拍板。以拍定之价格为计算标准，全场均须遵守，不得异议。

交易所的资金来源，据协进社社员说，当时协进社代表戴季陶与日商某企业代表商定办法，交易所资金确定为 500 万元，分为 10 万股，每股 50 元，用有限公司方式募集，如募不足额，可照票面向日商抵借款项，但以十分之七（即不超过 7 万股，350 万元）为限。交易所开办时，先收四分之一，即日方担任 87.5 万元，华方 3 万股担任 37.5 万元，共计 125 万元。协进社方面拿不出 37.5 万元的巨款，怎么办呢？有人代为设计：“日商 87.5 万元股款势必分存于华商银行钱庄，我们可先向这些行庄协商做 3 万股押股，如不接受此项条件，则日商的股款即不向他们的行庄存放。”这是以交易所名义的存款来做交易所股票的押款的办法。钱庄唯利是图，双方一拍即合。这样，交易所的 10 万股的股款，7 万股系日商代缴，3 万股系华商行庄代缴。对外来说，交易所 500 万元资本的四分之一，即 125 万元，都已全数缴足，分存于华商行庄。事情就是这样办成的。因此，交易所在开业以后，居然信用大著，营业一天好似一天，市场内人山人海，拥挤万分。

协进社为了使物品交易所成为合法经营的事业，于 1920 年年初派社员洪承祁来甬邀我同虞洽卿赴京向农商部交涉，质问为什么日商可以在上海办取引所，而中国人反不能在上海办交易所。洪承祁对我说，协进社在 3 万股股票中分给我 1000 股，原须缴股款 12500 元，因恐我一时不便，已代做押款 10000 元，现在只缴 2500 元即可；如果不愿做股东，可将股

票卖出，立可得价 17500 元，获净利 5000 元。此外，再送我旅费 5000 元，要我同虞洽卿赴京一行。我研究了日本的取引所法后，同虞到京，经过努力，农商部始制订了“物品交易所条例”，颁布施行。这个条例使虞洽卿主张的多种经营和张謇主张的单种经营的矛盾统一起来，就是说，虞、张所主张的两种交易所都可以办，使它们各得其所。政府方面也有利可图，即条例规定每个交易所应缴资本总额三分之一为保证金，并得向经纪人所做每一交易按照规定征收费用。交易所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当时交易营业额颇佳，交易所股票称为本所股，也加入证券市场买卖。开始时每股价在 30 元左右，到 1920 年春季已拍到每股 50 多元；及至物品交易所条例颁布后，本所股市价已到 80 元，至年终时每股涨到 120 元。这时每股所欠缴的股款四分之三，即 37.5 元，已全数缴清，交易所已实收资本 500 万元。协进社所有的 3 万股，据我所知，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最多只分给重要社员 15000 股（包括我的 1000 股在内），其余所有 15000 股早已卖到市场上去了。现在为了要缴四分之三的股款，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又将日商方面做押款的 7 万股股票全部赎出而卖掉 3 万股，这样加前存 15000 股共 45000 股，以每股平均获利 60 元计算，共可获利 270 万元。除去（一）日商押款 87.5 万元，（二）还有 4 万股保留下来的股子，每股应缴 37.5 元，共需 150 万元，两共 237.5 万元，尚余 32.5 万元，当然为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所得。至于已缴足 50 元的 4 万股股票，市价每股已值 120 元，共值 480 万元，也为戴、张、蒋等所有了。真所谓空手人翻云覆雨；白手起家，凭空发了大财。

当时我们几个人认为股票价格已达饱和点，不能再有所发展了。于是，洪承祁首先组织 800 万元资金的中易信托公司，

盛丕华代表张澹如去汉口组织武埠地产公司（准备适应建筑粤汉铁路的投机）。又听说北京证券交易所资本仅 10 万元，尽可扩充，结果扩充资本为 60 万元，上海方面参加 30 万元。我自己则向农商部呈准在宁波开办证券花纱交易所，资本为 120 万元。正在各谋发展的时候，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以为他们有实力（有每股 120 元市价的 4 万股股票），因而大做本所股买卖。1921 年年初，本所股每股市价已由 120 元抬高至一百五六十元，到年终时竟涨到每股 200 数十元，真如脱缰之马，横冲直撞。交易所原来订有 120 余条的营业细则（经理事会通过，农商部核准），规定卖主或买主应缴各种证据金，以便防止卖主到期不交货和买主到期不缴款，规定极为严格。但这时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不仅不缴证据金，反而强迫常务理事郭外峰、闻兰亭（他们是管市场业务的）等收受空头支票，充作现金。同时现货与期货（本月期货与下月期货）的差价越来越大，差金打出愈多，致会计上的现金大量支出。交易所由外强中干到捉襟见肘，拖延到 1922 年 2 月，宣告“死刑”，大量股票一旦变为废纸，大富翁变为穷光蛋了。我所经营的宁波证券花纱交易所也受上海交易所倒闭的影响而倒闭，牵涉较广，我为理债而来上海，寓白克路（现名凤阳路）一号。

物品交易所监察人周骏彦（奉化人，是我的同学和老友，也是蒋介石的老师）因套利而欠债 20 万元，到处被逼受困，再三说情，非 2 万元不能过门，急得两次跳黄浦被救。某夜，周由陈纪铭（奉化人，大包作头）陪同到我处来，要我设法救他。我自己也是走投无路，只能劝他慢慢想办法。当时大家都穷得叫救命。移时，日本又汇来 100 万元，交易所的负责人打算开股东会讨论复业。我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就在这 100 万元身上转念头。我的打算是把我所持有的股票先在交易所股东名簿上过了 100 个新户头，然后叫庄之盘（字莘墅，奉化人，

和我在日本同学）雇 100 个人作为股东，在交易所股东开会时到会场去质问交易所负责人关于交易所 500 万元资金和各经纪人保证金及各种交易所缴的证据金到哪里去了等等问题，他们如果挽人出来和我谈判，我就有文章可做了。我把这个打算告诉了周骏彦，以免他再去跳黄浦，哪知他当晚就去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也过不了门，第二天就跑来找我，说他经济上实在没有办法，愿意同我合作。我问他希望得多少，他说希望得 20 万元。我一听就当场回绝了。因为日本汇来一共只有 100 万元，现在周骏彦想要 2 万元救他一命还没有把握，蒋介石跑来一句话就要 20 万元，这怎么能与他合作呢？不料蒋介石对我来了一手“釜底抽薪”，他暗地赠送了庄之盘 1000 元，向他拉拢。这样，庄之盘对我的口气就变了。他说：“瑞元（即蒋介石）到你这里来表示合作，你怎么回绝他？”又说：“你初到上海，还不懂上海规矩。虞洽卿不是弱者，在租界上闹起事来，巡捕房不能不管，这就一定要通过法租界的黄金荣。瑞元同黄金荣有交情，你不同他合作，恐怕不容易成事。”我听了这番话，表示同意考虑。庄之盘接着就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说：如果事情搞成功，拿到的钱先救周骏彦的命，其次给蒋介石作川资去广东之用，然后给我。我同意这个办法。第二天，蒋介石在大东旅馆六楼开了七八个房间，约我去谈。我去后，庄之盘又提出：对这次“战役”，由魏任总司令，蒋任参谋长，庄任前敌总指挥，一切要听魏的命令行事。大家都同意这个提议。交易所股东会开会那一天，庄之盘所雇的 100 个人集合起来，我照约定交 60 元给庄，蒋介石再给 100 元，又加发了每人二角的酒钱。让他们酒醉饭饱后，由庄之盘领进交易所股东会会场，坐满了前几排。虞洽卿一看苗头不对，心知有异，就宣布延会一天。他们当晚请李征五（李在辛亥革命时任沪东光复军统领，他的部下有张宗昌，以后在法租界当“大

亨”）商量对付办法，交易所送他 5000 元。李征五当场拍胸，也找了 100 个人来对付。蒋介石看到情况有变，就叫庄之盘“先行退兵”，庄不同意，两个人闹到大东旅馆来。经过谈判，我认为应从长考虑，李征五是熟人，不要紧。而蒋介石却另找了叶琢堂（叶是流氓出身的金融界大亨，他在开赌场时与蒋有交情），由叶琢堂出面去找虞洽卿，说蒋介石没有法子去广东，要虞帮个忙。开始时虞说蒋搞垮了交易所，还要捣蛋，不能同意。最后谈判结果，虞答应可以由交易所拿出 6 万元，但要在蒋离开上海的那一天才能给钱。事情已经定局，不料蒋介石想独吞这笔钱，又叫庄之盘退兵。庄气得大骂，骂蒋忘记了在大东旅馆说过的话，质问他事情办好为什么不征求魏某的意见，又说：“若无魏的命令，我照前约是不退兵的。”这样一来，蒋又不得不到大东旅馆来把他同庄之盘龃龉情形告诉我。我以事既办妥，应请庄退兵。庄到大东后，蒋说预备给周骏彦万把块钱，同时给庄之盘几千块钱。正在这时，邵力子为了《民国日报》也到大东旅馆来分了几千元。其余 4 万多元的钱都在蒋手，不仅对我什么也不提，而且蒋乘送客之便，一溜就离开了大东。第二天，庄来告我说，蒋介石已密同周骏彦等去广东了。

上面所讲的事情，一晃已经 40 多年了。不久以前，我碰到当时在大东旅馆当茶房头目的阿春，他还谈起此事，好像当时情景犹历历在目，由此不禁引起我的回忆和深思，并且使我感到无限内疚。

（魏伯桢）

二、蒋介石、张静江关系的演变

张静江是浙江的盐商、财阀和早期的买办资产阶级的代

表，曾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和其后的大革命时期及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前一阶段历任国民党党政要职。把这一国民党右翼人物中部分经历和事迹记述下来，或许能够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资料。

家世、出身

张静江原名人杰，静江是其字，浙江吴兴南浔镇人。父张定甫，元配生五子（继侧室所生子女甚多，不详述）。静江排行第二，故乡里间及张氏亲友熟人都称之为老二先生。张家为南浔刘、张、庞、顾四大巨富之一（号称南浔四象或四大金刚）。前清时先以丝、盐起家，持有巨额盐引票，在浙江、江苏盐区设有盐公堂和盐廒，控制食盐运销；并将吴兴特产辑里细丝贩运出口，销售国际市场。在上海设有通运公司、通义银行和大纶绸缎局，在法国巴黎、美国纽约均设有通运公司分公司，除经营生丝出口外，兼营汇兑和其他进出口贸易，成为当时最早沟通国际资本主义进行通商贸易的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之一。

张幼年虽亦延师攻读诗书，但以出身豪富家庭，娇生惯养成性，及长，功名一无成就。年20左右，由父作主与苏州姚姓联姻。姚为苏州道员，虽慕张氏富有，但嫌其无功名而感美中不足，示意张父为子捐一官衔藉使双方门第相称。张父遂以银两10万为其捐了二品道衔，和姚氏成婚。

张所捐的官衔是“钦加二品衔，候补浙江实业道”，原来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衔。张的母舅庞元济（字莱臣）早已捐过同样的二品道衔，候了多年，也从未补上实缺。因此，张姚成婚以后也未获得实缺；却因富有，照旧往来于乡里、上海、苏州等地，过着享乐游荡生活。

张早年即成跛足，不良于行，人称“张跷子”。据吴兴南浔等地人说，张早年在南浔镇上一次火警中为保全张家市房，

亲率救火队(张家房产多，有消防设备组成救火队)上屋救火，不慎跌下伤足而成残疾。上海有人说张救火伤足，尚能勉强行走，由于居留法国巴黎期间，生活放浪，沾染花柳病，治疗不慎，伤中坐骨神经，遂成瘫痪痼疾。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5月，杭州人孙宝琦任出使法国大臣，张静江夤缘以一等参赞名义充当孙之随员出国。当时张以这个差使，可以借佛游春，到国外游历，增长些见闻，颇为称心合意，就此欣然登程。

张在随孙出国赴欧轮中邂逅孙中山先生。孙见张尚在青年，官职不高，认为可以通过说服使其脱离清廷参加革命，遂以真名实姓和进行革命推翻清廷等主张相告。张和清廷原无深切关系，也看到当时慈禧太后擅权的腐败情形，对孙主张革命认为有成功希望。张心机一动，觉得此时对孙进行联络，参加孙之组织，一旦革命成功，就可位列显要，遂向孙表示赞同，愿意参加孙之组织，并殷切询问，此去何往，作何计划？孙当告以将经由欧洲再到美国等地向华侨宣传进行募捐，以供国内建立革命武装和活动之用。张即向孙表示愿先以白银3万两助孙，当写亲笔信给美国纽约通运公司经理姚叔兰(张妻舅)，凭信一次照付。信交孙中山后，张并密告孙中山，钦差大臣孙宝琦亦同轮赴法，请孙注意，谨慎将事。孙中山对张益觉忠诚可贵，约定日后行踪可由纽约通运公司探询而别。

孙中山到了美国，果然凭信在纽约通运公司取到白银3万两，对张萍水相逢竟能如此热心，颇有好感。

孙宝琦不久回国，张推说巴黎、纽约私人营业要往料理，事毕再回国相从。孙宝琦原知张不过一富家子弟，在幕中无足轻重，亦不坚留，张遂不再回国。由于有纽约通运公司的线索，张不久便找到孙中山先生。孙相见之下，慰勉备至。张亦向孙表示，除效忠于孙之革命外，并愿继续输财相助。孙中山